

第一章 導論

本研究之問題意識為消費主義與公共事務涉入之關係。藉由分析中國大陸城鄉白領青年感染消費主義的相異程度，以解釋他們在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和行為；透過此，進而闡述中國大陸兼蓄併存的城市消費個人主義與農村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差異。

自八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掀起消費主義的浪潮，其所代表的意義不光是一種廣泛的經濟活動，而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背景下，與西方消費社會、話語所進行的互動及連結，而該連結也廣泛地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掀起中國大陸社會消費主義傾向的組成力量也類同於西方現代化的國家一般，是由城市「中產階層」與「青年性文化」所帶領的消費主義風潮，¹ 並進而隨之擴展至整個社會。這一群在改革開放後即享有中等收入、較高教育與職業類同於白領的青年新階層群體，² 其城市生活中多半佔據著消費前衛的氛圍，並通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將個人的商品符號認同、享樂消費行為與私人體驗結合，並轉化為一種政治力量，也就是 Giddens 所說的「生活政治」，這是相對於政治解放而言，著重在自我選擇與自我實現生活方式。³ 因此，在生活政治佔據了個人生活，白領青年對日常以外的公共事務涉入，便會表現出冷漠、忽視的態度及行為，最終，逐漸產生政治後衛的姿態。換言之，這些收入中產的白領青年在消費的前衛和政治上的後衛之間，確實隱藏著某種連繫。

承前述，美國學者 C. Wright Mills 曾探討地位惶恐導致美國新中產階級出現所謂「消費前衛、政治後衛」的行為。亦即消費的需求與滿足會直接或間接地導

¹ 中國大陸在官方的正式文本中並未使用「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的概念，一般文獻均以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或中產階層等作為常見的替代。此外，在 2002 年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大陸中產階層的人數已達 8000 萬人以上。參考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254-256。

² 關於新社會階層的官方解釋，最顯著的政治話語莫過於江澤民曾於 2001 年 7 月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80 週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參考江澤民，**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 169。

³ 李陀主編，**上海酒吧：空間消費與想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 92。

致人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並且，隨之而來的是對於公共事務參與上的意志麻木與精神上之貧乏。⁴ Mills 的說法映襯了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亦即消費主義傾向與公共事務涉入的關係。故，當消費社會在中國大陸獲得政治、經濟的正當性支持後，藉由經濟發展內在條件所衍生出的社會消費空間，便出現由消費文化意識型態、商業消費、國家權力與商業資本所構築交疊而成的消費場域，⁵ 而作為外在條件的全球資本主義更趨使中國大陸消費社會之興起。在此之際，由改革開放後的新中產階層—白領青年所代表的廣大消費族群，便成為帶領其它階層群體融入消費社會的主要驅動力。因此，當消費作為社會最主要的活動時，也連帶對該社會發生了支配性的影響力；⁶ 而白領青年作為消費社會的最重要群體，其對於國家政治、經濟事務涉入的態度及行為便有其重要意義。其中，特別是對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經濟發展與改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第一章將說明研究背景與目的、議題重要性、研究架構及方法；第二章則援引中國大陸消費主義、公共事務涉入、城鄉差距和中國傳統集體主義之理論、數據與現況，並列舉相關學者針對消費主義影響公共事務涉入的解釋；第三章說明城市白領青年高感染消費主義後，如何型塑他們對公共事務涉入態度和行為之影響；進而，第四章便敘述農村白領青年低涉入消費主義，並保有傳統農村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而該價值觀影響他們在公共事務涉入上的態度及行為。此外，本章亦將比較城鄉白領青年在消費主義感染與公共事務涉入的各種態度與行為上之差異。文末，筆者將於第五章總結、歸納研究發現。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般而言，消費主義傾向來自於「消費水平」與「消費主義」的雙重影響。在中國大陸，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距顯著，消費水平之高低乃既定現況，因而，

⁴ C. Wright Mills 著，楊小東等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 1-15。

⁵ 同前註，頁 114-115。

⁶ 鄭也夫，**後物欲時代的來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9。

是否感染消費主義便成為影響消費主義傾向的重要指標。此外，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消費行為從以往的單維、雙維生活，⁷ 轉向現今再格式化後的多維生活。即消費不僅僅使得階層分化後的不同群體差異性更為擴大之外，相同消費模式的近似群體有可能是純粹理性生存的機械人，也或者落入一種絕對情境之外的生活。⁸ 而消費生活與文化在歷經了三大過程的洗禮後，即貨幣化、市場化、資本化，使得人們得以將足夠的消費能力用在購買、追求那些由勞動力轉化而成的各種商品，此種行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深具正當且獨具合理性，特別是瀰漫消費主義思想的城市。

因此，當市場經濟中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獨占主流時，該情況最可以反映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消費差異。在城市，消費無所不在，伴隨著經濟的驚人成長，部分消費內容甚至漸趨向奢侈性與非必須的休閒、娛樂支出轉移；在農村，消費並非被箝制，但由於相較於城市的消費水平，大部分的農村消費仍停留在對於生存物資匱乏下的基本需求購買，特別是那些貧瘠的農村。而即便是沿海發達城市近郊的農村較為富裕，但由於其消費場域的限制與相較於城市消費主義的影響較小，也使得農村的消費文化相較於城市而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

於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社會分層，藉著經濟發展成果而嬗變出新中產階層，消費一詞也意味著以經濟力量對社會進行系統性的劃分，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消費模式，社會階層決定了消費結構。⁹ 同時，消費也不停地對變動中的群體產生重構或形塑特定階層的消費認同，並進而突顯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區隔。正因為如此，端視中國大陸城市與農村白領青年的消費主義傾向差異，便能體現城市與農村的巨大差別；而因城鄉差距所形成的社會分層，除了顯示社會的縱向結構之外，還能較為客觀的界定由於各階層群體掌握社會資源的能力與機

⁷ 單維生活意指以家庭為主的生活空間與方式；雙維則代表家庭與工作單位並重的兩種生活重心。單維與雙維生活代表著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嚴格的戶口與工作制度之投影，同時也代表著由國家統一格式化後的生活空間。

⁸ 參考薛莉，**白領階級生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2。

⁹ Mckibben, Bill 等著、朱琳譯，**消費的慾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20-21。

會之不同，進而導致了高低有序的等級或層次。¹⁰

此外，在九〇年代初期時，由於中國大陸開始實行雙休日工作制，城鎮居民有閒暇從事各種活動，因此，配合越趨增高的個人/家庭收入，大量湧現的各種消費活動便使人們將注意力從政治轉向消費社會中。然而，為什麼經濟的成長與消費力的提升，能輕易地喚醒人們對消費之追求與對物質之渴望，卻未能將同樣的自主性表達在政治與公共生活的領域之中？換言之，城市白領青年若與原生於農村的白領青年有著相同的經濟收入，然而，又是什麼原因使得兩群體在公共事務涉入參與上有著城市冷漠、農村熱情的態度？

儘管，中國大陸自 1978 年以來實行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全面地改變國家在社會的治理情況，特別是對公民的公共事務涉入有著重要的意義。其中，除城鄉基層治理與選舉的議題外，許多民間組織不僅要求和鼓勵其成員積極參與組織內部事務，同時，也鼓勵他們參與部分的國家政治生活。但是，一個鮮明的現象表現在民間組織對社會政治參與的程度遠高於普通民眾，特別是在農村與城市的基層。¹¹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轉型社會下的城市參與，其在被動員性地參與選舉實為必要，原因是來自於「強制失效」（國家力量的式微）以及居民「門戶隔絕」（居住空間的私密性）之故。¹²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強制失效？又是什麼原因造成門戶隔絕？是消費社會發展成型後的集體疏離？亦或是城市消費主義傾向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個體孤立與冷漠？

上述問題說明中國大陸處於經濟發展的階段時，分別來自於城市與農村的青年白領，因生長在二種不同場域中，致使他們在消費與政治生活的態度、行為上具有歧異性。其中，無論是城鄉的經濟發展情形、消費主義氛圍、自主意識表達以及政治涉入等交互關係之差異，均表現出錯綜複雜並深具意義的文化價值網

¹⁰ 黃京華、楊雪睿、呂明杰著，**多種型態的中國城市消費者**（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4），頁 92。

¹¹ 俞可平主編，**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中國與俄羅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頁 4-12。

¹² 耿曙，「居委會選舉的政治意義：中國大陸動員式選舉參與對其城市居民參與意識的影響」，**城鄉公民參與和政治合法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 251-253。

絡。本研究在此脈絡下，除突顯城鄉白領青年感染消費主義傾向與公共事務涉入關係之間的重要性，同時，也一併涵蓋欲解釋當消費文化價值的轉變時，政府、社會與個人間的關係。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乃冀望透過探討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持續不斷經濟發展，城市與農村白領青年因感染消費主義傾向的程度不同，並進而影響其公共事務涉入的相異態度及行為。易言之，工作在城市，但原生分別來自城市或內陸農村此二群體的差異，進而，該差異除代表著城市、農村白領青年成長在不同生活空間的意義外，並也隨之影響他們在城市日常的消費場域、品牌偏好與社會資本之選擇等發展向度，而該向度會對於其在公共事務涉入上有著顯著的影響。因此，藉由本研究便可對中國大陸基層治理參與及公眾事務涉入的發展作一解釋性的功效，並同時可預測其未來的發展。

第二節 消費主義影響公共事務涉入的重要性

隨著改革開放而起，以消費主義作為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已全面改變中國大陸民眾的日常生活，而此種改變是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最終再向農村逐步推進的漫長過程，並且，推進的動力是從受過較高教育並具資本的社會階層向其它階層推進，同時，在前述條件發展程度不一的情況下，致使中國大陸目前還是多種生活方式併存的社會，更重要的是，其為新、舊生活方式並存的社會。¹³ 據此，研究中國大陸的消費主義可進一步理解多種生活方式併存的社會中，因感染消費主義的相異程度，進而對社會的價值觀、生活實踐與公共事務涉入等面向有何關聯與影響力。

承上述，許多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學者均對於工業社會後出現的現代化城市提出各種批判，特別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與法國的文化研究學者。在批判背後，除突顯消費社會的興起外，其所代表的意義不再是社會價值轉變的簡單變革，而是

¹³ 黃平，「生活方式與消費文化：一個問題、一種思路」，*社會學研究*（第3期2003年），頁53。

在這些變革後的一系列宰制與操控痕跡。在市場經濟發展的環境中，收入增加的消費者透過購買商品的行為表達其自主性，然而，這些由不同消費行為所區隔出的社會階層，更加地使階層間的差距擴大。許多學者對消費社會的批判便集中在前述消費行為下的等級差異，並且，造成等級差異的結果，一切源頭都指向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因此，在中國大陸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式後，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發展差距大，而各階層透過消費分化而來的等級差異自然也更明顯。在城市，經濟發展力強、社會分層之優勢都在相較於農村之後來得突出且優異，但城鄉兩區域均屬一個國家治理的狀況下，卻因區域經濟發展之差異而具有顯著的社會價值與消費文化的歧異性，這也正代表著研究中國大陸消費主義與公共事務涉入之關係將具有深刻的意義。

第三節 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進展及政治參與的定義

胡錦濤於 200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 17 屆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政治報告時，強調「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此舉揭橥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民主參與的重要意義。政治參與，在西方民主國家所代表的是人民對政治與公眾事務的意見表達與影響政府的決策，同時，也是人民藉以將主張與權利反饋給政府的管道。在中國大陸，政治參與仍侷限於地方基層選舉，其是一種對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參與行為。而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參與的改革前沿，乃是將社會管理體制的權力下放，由地方人民自主性的參與基層組織選舉，這不僅代表政治上的體制變革，同時也對社會管理體制造成實質的衝擊與挑戰。

基本上，西方所謂的政治參與有多種不同形式，一般來說，政治參與活動可大略分為以下數種：(1)投票行為、(2)院外活動(指遊說)、(3)組織活動、(4)接觸、(5)暴力等，¹⁴ 這五種形式是美國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 所下的定義。值得注意的是，Huntington 所定義的政治參與是指「包含影響政府決策活動的實際行

¹⁴ Huntington, Samuel P.著，汪曉壽、吳志華、項繼權譯，**難以抉擇**(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頁 13-14。

為」，其並不包含政治態度等內在的變項。特別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大陸為社會主義國家並奉行政左經右架構的特殊體制所致，若以西方民主國家對政治參與的標準來檢視，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參與自由度相當低。但在，在有限度的民主之下，國家將基層選舉的權力下放也代表基於人民對民主化要求的回應，更是對於人民權利的回應。因此，雖然目前研究中國大陸政治參與的文獻通常僅聚焦於基層選舉或地方自治行為，但其代表之意義在於除能體現中國大陸政治參與的特殊性外，若國家持續朝向改革方向前進，並修正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的道路邁進，則對於中國大陸未來在人民政治參與上的定義，仍還有變化的可能空間。

另一方面，針對中國大陸基層的政治參與定義中，史天健在針對北京市民的政治參與研究時，將其定義為「個體公民企圖透過行動以影響政府政策的實際結果」。其中，他特別指出，中國大陸民眾的政治參與會傾向改變政府政策對他們的衝擊，而不是改變政策本身的行動。而這是由於絕大多數有關政治參與的實質利益之供給，是直接被國家所控制並分配，再加上參與的行為在中國乃集中在政策執行階段。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參與行為中，人民便很難透過實際的實踐方式同整個社會領域及重大議題產生密切連結，進而，使這種特殊安排下的政治參與，只能僅限於連結政治與個體私人利益的關連性。¹⁵ 易言之，史天健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參與無法直接影響國家制定政策，抑或對社會領域重大議題的過程、結果產生影響。政治參與的效用僅能與自身利益相結合，無法和國家、社會整體利益產生連結，亦即，僅對自身居住地的公共事務參與形成影響。

John P. Burns 也曾對政治參與提出定義，他指出，「政治參與是指具有主動積極性的公民意圖影響公共事務」，其概念同時包含欲影響政策的規劃與執行。Burns 在研究中國大陸農村的政治參與時認為，人民參與政治的原始意涵具有自願傾向，但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菁英利用勸服和社會壓力等方式，動員農村民眾進入政治，便使得地方政治表現為村領導和村民互動作為主要發展面向。另一方

¹⁵ Shi, Tian-Ji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21.

面，當農民被官方的規範(如：村組織)所社會化後，國家政治體制進而獲得正當性，而地方社區或村莊便被廣泛地整合為一個個「單位」，這也使得選舉有著區域化的特色；並且，對中共的政權而言，參與也意味著動員農民進入並執行黨的政策。¹⁶ 總結 Burns 與史天健的觀點，二者均認為中國大陸基層政治參與的重要特徵是「執行黨或國家政策」的行為，而非如 Huntington 針對西方民主政治參與的定義：「一種影響政府決策活動的實際行為」，由此足見，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式民主與西方民主的差異性。

綜合上述，中國大陸的政治參與雖尚屬初期階段，但地方基層選舉代表的不光是國家統治體制上的改革，同時也意味著人民的權利提升；更重要的是，面對國家權力下放的廣大人民，無論在實際的公共事務參與態度和行為是否產生了重大變革，其中，積極甚或消極的動員式/被動員式參與，以及影響人民參與態度與行為之背後原因，都在在影響著國家、社會與個人關係的互動，因此，便更加突顯本議題的重要性。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文所提及公共事務涉入不同於諸多學者定義下的政治參與，由於後者往往被狹義的侷限在選舉投票的行為之上，而較不指涉為廣義的社區公共事務參與，或對國家政治事務動向的關注，因此，本文將不採納一般使用的「參與」概念。筆者將參與的定義轉化為較具廣泛性意義的「公共事務涉入」之概念。其中，包含二種指標：一、城市與農村白領青年對於曾居住、現居的社區居民委員會(簡稱：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簡稱：業委會)/村莊之村民委員會(簡稱：村委會)事務涉入，其中具體表現在其「是否透過管道接觸、表達、反饋或實際參與」；二、城市與農村白領青年「對國家政治事務的涉入，具體定義範圍乃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國政相關議題的認識」。此外，本文敘述「涉入」(involved)的概念時，

¹⁶ Burns, John P.,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11.

是以城市與農村白領青年在各自態度、行為上二者的「相對」(relatively)程度的高低與多寡為別，與一般所定義的「參與」(participation)行為略有不同。

上述關於涉入的範圍選取上，除了對國政相關議題的認識外，還包括居住地區的集體事務涉入。其一，便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現階段房地產市場的不規範，以及產權保護機制的缺失，導致利益糾葛之下的受害者往往是業主，於是便出現了中國大陸城市特有的業委會。¹⁷ 業委會代表著是一種「維權運動」，即擁有房產的業主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形成的組織，參與該組織的行為便是居民對公共事務涉入的具體表現。其二，同樣的公共事務涉入情形也表現在城市地區的居委會，以及農村地區的村委會。前述組織均為本文定義城鄉白領青年對小區／村的公共事務涉入範圍。

此外，在對象限制上，本研究定義的「青年」，是指涉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後所出生的世代，也就是 30 歲以下的群體，且必須符合地方(城市／農村)基層選舉投票權資格。針對 1979 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後出生的群體作研究，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也讓這一代「獨生子女」進入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生活環境，並且，這種情形特別表現在城市當中。另一方面，這些獨生子女的父母多生於飽受大躍進或文革衝擊的五、六十年代，因曾飽受物質短缺所苦，進而導致他們在子女成長中對於物質的供給往往毫無限制。也因此，城鄉兩群獨生世代的白領青年，是如何因居住地區的不同而在城市出現相異的公共事務態度與行為。

綜合前述，本研究假設為：**消費主義抑制個人對公共事務涉入的程度**。研究自變項為「消費主義感染程度」，依變項為「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與行為」。透過對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直接受益者—獨生白領青年群體的研究，可突顯中國大陸白領中產階層青年之消費生活實踐，以及隨之相應的公共事務涉入態度、行

¹⁷ 2002 年中國大陸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城鎮居民擁有私有產權住房已達到 45.2%，「業主」已演變為日益壯大且擁有房產的市民代名詞。參考鄒樹彬，「住宅小區中的民主—城市業主維權行動的興起及其影響」，載於唐娟主編，**城市社區業主委員會發展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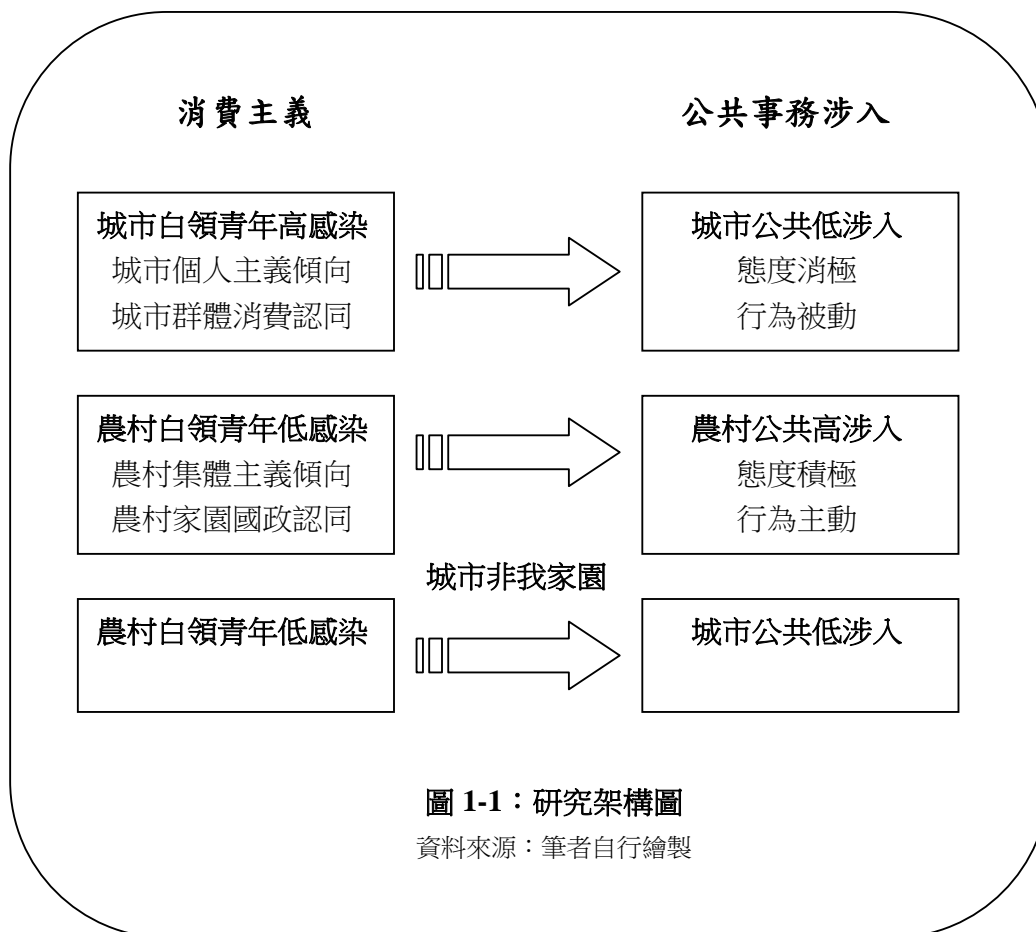
為。因此，面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所發生的價值觀嬗變，這群受過較高教育的白領青年，他們在公共事務領域的表達／不表達態度、參與／不參與行為，均對於中國大陸基層治理和民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同時，針對現居於城市，但出生背景來自於城市、農村二區域成長的白領青年作為研究對象，除可突顯此二群體在原生區域所培養的相異價值觀外，還能得知原生農村的白領青年於城市工作後，是否會受城市消費主義氛圍的感染，進而扭轉原先積極、熱情涉入公共事務的態度與行為。若前述結論為肯定，則說明來自二元結構差異大的城鄉白領青年均會受到消費主義型塑而產生相同的價值觀和行為；另一方面，若結論為否定，便代表原生的價值觀念體系並不會受到後發居住地域的全面取代，即農村白領青年仍將保有在原生地所培養出的消費、公共事務涉入之價值觀與行為。

綜合前述，當中國大陸的社會階層在改革開放後的高速經濟發展下出現新的變動，該變動也具體帶動了社會結構的變化，這群再階層化後新中間階層—白領，以及帶領消費社會流行風潮的青年，對社會轉型後的文化價值嬗變產生重大衝擊。因此，研究白領青年感染消費主義的相對程度，以及消費主義如何影響他們對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行為，將能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提出解釋。透過此，本研究將結合消費主義之感染與公共事務涉入的實際態度、行為，以充分證實二者間的因果關係。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消費主義抑制公共事務涉入的研究界定與假設，本研究所因此發展的架構圖如下。



二、研究假說

透過上述研究架構，本文透過研究假設：**消費主義抑制個人對公共事務涉入的程度**，進一步發展出下列三組不同的假說：

假說 1：城市白領感染消費主義程度高，城市公共事務涉入冷漠。

- **消費個人主義傾向：**由於受到消費主義的高度感染，城市白領青年對物質追求的自主性高、能力也高，消費行為具有個人主義特質。日常生活偏重自我物質欲望的

追求，並與媒體的使用與滿足連結，導致衝動與享樂性消費支出高。由於價值觀具個人主義，因此對集體的國政、公共事務冷漠不感興趣。

- **城市群體消費認同**：由於維護、拓展社會資本，因此透過群體的消費認同影響，進而將生活目標定於與自身認同的團體具有相同的消費追求，並在群體間進行攀比消費。由於日常交往具有區隔化其他群體的特質，因此對非本群體的公共事務不產生熱情，也不投入時間參與。

假說 2：農村白領感染消費主義程度低，農村公共事務涉入熱情。

- **農村集體主義傾向**：農村白領青年受集體主義思想價值體系影響仍重，因此，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的消費居於保守，並僅具基本生活開銷型支出之特色。並且，受個人主義影響低，自主性花費較少的部分原因是須將收入匯回鄉供父母使用。此外，在集體主義的影響下，集體討論的態度熱情、集體參與行為積極。
- **農村家園國政熱切**：農村白領青年受到農村公共事務的集體涉入氛圍與網絡熱絡影響，在農村對家園與國政事務主動關注力高、凝聚力亦同。於城市工作後，仍關切家園公共事務，也對國家時政的議題持續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及熱情。

假說 3：農村白領感染消費主義程度低，但因城市非家園，他們對城市公共事務涉入冷漠。

- **城市非我家園**：農村白領在城市工作，但城市並非他們永久居住地，儘管他們受到消費主義的感染程度較低，在公共事務上的涉入較深，但相對於原生地的農村而言，他們並無動因參與自身未落戶的小區事務，因此，在城市的公共事務涉入冷漠且消極。此外，他們對家園的熱切，也轉移到在城市工作時仍持續對國政訊息投入高度關注力。

根據上述假說，關於消費主義的立論可見 Inglehart 對物質主義的描述，即在城市物質主義的氛圍之下，社會傳統價值逐漸向現代化的理性價值轉變，教育程

度提升，個人的收入、支出也高，生活環境體現在消費至上的普遍價值之彌漫，而政治仍由國家權威所操控。此外，由於經濟自我表達能力與個人經濟成就化的動機，使居住在物質主義城市的人們特別關注國家經濟的穩定成長與維持。本假說主要驗證城市白領青年受物質主義感染，而出現與農村白領青年不同的消費態度與行為。其次，藉由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集結，即國家透過媒體與大眾文化的管道，散佈其正當化統治的意識型態，同時，人民的購買力與欲望透過媒體操控與個體消費而得到心理上的滿足，進而認為消費是一種信仰價值且深具正當、合理性。此外，由於消費欲望的追求而導致人際之間的疏離與隔絕感，也致使個人對公共事務的冷漠、無異議。再者，承自於 Veblen 與 Bourdieu 的論述，即消費是滿足自身的品味喜好，以及為了區隔自身與其他群體的不同，或是希望尋求某一群體的認同，進而在消費的行為上出現奢侈性消費及符號、品牌消費的現象。此外，自身期望透過消費展現特殊的品味，並透過對該品位、時尚的追求，以突顯個人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同時，因為全心全力貫注在經濟與地位的追求，因而對政治地位不感興趣。

另一方面，集體主義的立論是根據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文化及其轉變後的觀點作為假設。此所指的傳統政治文化乃是指一種觀念緩慢成長，且較易蘊含而擴散的文化內涵，在此特徵下，中國大陸的集體主義還與社會主義集體產生有機的結合，並出現中國特色式的集體主義。嚴格來說，雖然政治文化在西方的解釋以 Verba 認為其是由包括「經驗性的信仰、表達的符號與價值等三者交織而成的一種體系為社會主流所認同觀點。」¹⁸ 但是，構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涵，一般多認為是以儒家的哲學思想影響為甚，即強調由個人乃至於國家統治者均以倫理道德規範作為做人處事之圭臬；此外，也有如 Belazs、Pye、Solomonm 與 Michael 等學者從中國以農立國，因而常難以避免天災的匱乏經濟、強大官僚制度結構下的經濟發展，以及特有的家族主義下之社會化作為探討集體主義的重點。¹⁹

¹⁸ 江炳倫著，**政治文化導論：理論與個案研究**(台北：韋伯文化，2003)，頁 15-16。

¹⁹ 同前註，頁 151-153。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兩種資料蒐集途徑的結合

本文的研究方法將透過質性研究的田野調查進行，透過實地在中國大陸上海市進行蹲點，貼身觀察城市與農村白領青年在消費態度與行為的差異，以及該差異如何影響二群體在公共事務涉入的差異。同時，在一系列訪談中，本文的資料蒐集採取結合「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及「半結構式的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透過兩種途徑的研究方法互補研究上的限制，可在宏觀的數據資料蒐集外，同時兼顧微觀的生活探索，在訪談外逐步深入參與並觀察受訪者的消費生活實踐、生活史(life history)、同儕聚會及工作、求學、居住與消費之場所、以及其對於公眾事務涉入的態度及實際行為。透過解讀，親身接觸，期望能更具完整地呈現訪談資料。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的順序上，筆者將先就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建立初步歸納，其後，透過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與半結構式的問卷進行。首先，對目前在城市地區工作的白領青年與報導者進行訪談，除了針對本文研究架構所列舉的問題外，同時實際地參與受訪者的物質消費生活，接著，再詢問公共事務涉入的相關問題，並透過互動參與的過程發展可能遺漏或疏忽的其他面向。最後，藉由親身陪同、深入其生活空間之體驗，將觀察所得的個案特徵結合情境知識，進而編織、擴展個案至整個社會過程，自特殊中抽取普遍，由微觀邁向宏觀。

二、研究範圍、訪談對象與學術支援

筆者在 2008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赴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地點以上海地區作為研究範圍，此乃由於中國大陸經濟開放與發展是以沿海開始向內陸推進，上海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而上海在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後便一向是

接收外來消費文化的先驅，選擇上海不啻為研究消費主義的最佳區域。其次，上海作為經濟發展的首善之都，吸引許多來自農村的青年前往打工、就業，樣本取得較為容易。另一方面，筆者也於田調期間赴北京一星期，期間與研究中國大陸基層治理之相關學者及街道辦工作人員等進行訪談，此外，於北京期間筆者曾赴近郊的河北省廊坊地區之農村參觀，並藉訪談該農村數位村民，進一步瞭解農村現況，同時，該行亦與廊坊地區人大委員、台辦主任等官方人員餐敘，不啻對筆者敘述農村現況、背景介紹等面向提供了有利的參考。

此外，本研究亦透過耿曙教授、陳陸輝教授所帶領的「政治大學基層選舉與治理研究團隊」取得學術支援，藉團隊在中國大陸連續數年進行的研究資源與調查經驗，以及同上海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良好合作關係，使得本研究得以受到豐富的學術協助。此外，本研究亦藉由陳德昇老師的幫助下，協同接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提供大量生活上的支援，上海社科院王海良老師亦引薦研究中國大陸青年文化與消費主義的學者，以補充本研究在報導者訪問的不足。另一方面，再藉著筆者本身的關係網絡與上海各學術單位接待同學的介紹下，透過滾雪球的方式，進而擴展更多城市、農村白領青年之個案，並儘可能在操作上分散案例來源。

在訪談對象的界定上，如先前所提及，以符合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後出生(30歲以下)且已成年(20歲以上)者為按例，並且受過高等教育，正任職於企業的白領等標準為條件。此外，為區隔城鄉群體，城市白領青年與農村白領青年的差別來自於後者的原生地為農村，但現居地與工作地區均在城市（上海）。

另一方面，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除含括當事人—白領青年（城市與農村出生），還包含「報導人」（key informants）的訪談。報導人包含研究消費文化與公共事務參與等相關議題的學者，以及負責監督並執行地方基層治理選舉的區域民政官員。期望能透過訪問報導人，及其提供的資料輔佐本文，使研究更具客觀性。